

学科史视域下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

徐秀军◎

【内容提要】 在国内学界，尽管将政治与经济因素结合起来研究国际问题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如果从学科发展来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意识相对淡薄，学科建设基本处于国际关系研究框架下的酝酿阶段，而90年代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发展较快。这主要表现在，学科建制日益完善，研究队伍的专业背景日益多元，研究议题涵盖了贸易、货币金融、投资、区域一体化以及能源、气候等多个领域，并且尤为关注国际制度研究。以此为基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步形成了制度化的学术研究网络。尽管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存在诸多问题，但总体来看，学科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适应国际形势变化、逐步走向世界和融入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步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综合性学科发展体系，并形成了以政策导向、现实导向和宏观导向为特征的学术研究发展路径。展望未来，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将继续保持和呈现学科的专业化、多元化、制度化以及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学科史 国际政治经济学 学术共同体 研究议题

【作者简介】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

电子信箱：xjxu@cass.org.cn。

* 感谢张宇燕、阎学通、王正毅、樊勇明、袁正清、徐进、郎平、冯维江、李巍、朱杰进、任琳等学者以及《国际政治科学》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但文责自负。因资料搜集和学术能力有限，文中必定存在诸多错漏之处，对此，向读者以及有关学者和机构表示歉意。另外，为便于论述，本文提到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

《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4期（总第40期），第111—145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意义讲,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主要形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向学界明确提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相互忽视的问题,呼吁国际问题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并由此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但是它主要脱胎于国际关系学。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亦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这一方面对外交外事工作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使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的需要日益紧迫。在此背景下,国内陆续成立了专门从事外交外事人才培养和国际问题研究的教学研究机构,并鼓励和支持国际研究学科的发展。1955 年,外交部成立了专门培养外交外事人才的外交学院。1956 年,新中国第一所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正式成立。^② 1964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所,这一研究机构即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前身之一。^③ 与此同时,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我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设立国际政治专业和相关研究机构,并成立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④ 分别开展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的研究和教学。这些举措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国学界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在此期间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及次年 3 月 30 日

① Susan Strang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6, No. 2, 1970, pp. 304 - 315.

② 1958 年,该研究所更名为“国际关系研究所”,并与中科院脱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际关系研究所”被撤销。1973 年,该机构重新筹建后更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1986 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2014 年 6 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再次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③ 197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原中国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④ 2008 年 7 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更名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发表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逐步得以恢复。^① 总体看来，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整个 90 年代，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意识相对淡薄，学科建设基本处于国际问题研究框架下的酝酿阶段，而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尽管结合政治与经济因素来研究国际问题由来已久，但从学科发展来看，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起步落后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并且研究的视角和关注的重点也与西方不尽相同。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发展以来国内的研究成就、进展与特色，本文对 1978 年以来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了一种历时性的梳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历时性的研究综述属于学科发展史的范畴。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教授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论著出版情况；二是课程设置与研究项目（包括学术岗位的聘用）；三是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包括学术会议、专题讨论会和讲习班等。^② 结合科恩的建议以及国内学科发展的现实，本文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概况的梳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着眼于学科发展、学术共同体和研究成果等方面的进展进行阶段式论述；二是试图揭示这些进展的时代特点与动因。

一 改革开放与学科意识的萌芽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的认识逐步超越传统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进入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以及中国与

① 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参见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 180—181 页。

② 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世界政治经济交往的深入发展,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意识逐步增强。

(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这一时期, 国际上一系列新问题与新现象不断涌现。其中, 以下四个问题或事件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由于美国无力承担稳定美元汇率的责任,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瓦解, 从而引发人们对一国国内经济的变动与国际经济体系关系的探讨。二是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1973 年的石油危机触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 1978 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成为 70 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这让人们意识到小国特定资源的巨大政治经济影响。三是东西方关系的缓和。美苏关系的缓和不仅结束了东西方国家间的政治对抗, 还为两个市场——以“经互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间加强联系创造了条件。四是西欧联合趋势的加强。这一时期欧洲共同体实现了第一次扩员, 并从共同外贸政策开始向经济联盟迈进, 政治合作也在逐步加强。国际背景的变化, 不仅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素材和土壤, 也为中国学者观察和理解世界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从国内来看, 中国同外部世界政治经济的联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拥有了许多新的基础和条件。概括起来,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1971 年 10 月 25 日, 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 从此联合国成为中国大陆开展对外政治经济交往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二是中国外交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一时期, 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同日本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同西欧国家出现建交高潮, 同东欧国家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得到恢复和改善, 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等, 大大拓展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三是对外开放

政策的提出与实施。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势，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的任务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① 对外开放不仅反映在中国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交往上，也反映在逐步放开或取消封锁国内市场和投资场所的保护政策，从而促进了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接轨。

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中国的对外政治经济交往得到迅速扩大并随之变得日益复杂，这凸显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受“文革”影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形成的基础十分薄弱，致使相关研究不仅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发展严重脱节，而且也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拉开了差距。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不仅扩大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交往，也惠及了中国与国外学界之间的学术传播与交流。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日益深入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中国悄然兴起。但从学科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仍处于孕育和萌芽阶段。

回顾这一时期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在促进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与成果传播方面的努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说，这些努力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外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翻译。^② 例如，1987年，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布鲁诺·弗雷（Bruno S. Frey）的著作《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出版，给中国学界展现了现代国际交往中政治与经济两种因素错综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第1版。

② 由于译著的作者为国外学者，因此本文未将国外文献的中译本作为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但涵盖国外文献的介绍和评论。

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① 1989 年, 琼·斯佩罗 (Joan E. Spero) 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② 和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 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③ 中文版相继面世。与此同时, 一些国外学者的学科评述也被陆续翻译成中文。^④ 二是对国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评介。这一时期, 国内学者对国外论著评介关注的著作较少, 主要有对美国学者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⑤、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教授布鲁诺·弗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⑥、日本国际政治学者川田侃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⑦、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⑧ 等论著的专门介绍和评论。

这一时期还有学者较为综合地评述国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展。例如倪世雄, 吴开平、桑玉成, 以及陈德照等学者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跨国公司和美国权力》、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丹尼斯·皮雷奇斯 (Dennis Pirages) 的《世界经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内容》、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的《霸

① 布鲁诺·弗雷:《国际政治经济学》, 吴元湛等译, 重庆出版社, 1987。

② 琼·斯佩罗:《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 储祥银等译, 北京,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89。

③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杨宇光等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④ 例如, 德·布莱克:《国际政治经济学: 当前的问题和未来的需要》, 陈德照译, 《世界经济译丛》1987 年第 3 期, 第 2—8 页; 图泽:《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崛起: 现实主义派的观点》, 杨宇光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9 年第 1 期, 第 38—41 页; 罗伯特·吉尔平:《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杨宇光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9 年第 1 期, 第 12—15 页; 山崎晃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动向》, 李玉新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9 年第 1 期, 第 45—47 页; 等等。

⑤ 毕建海:《〈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评介》, 《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7 年第 2 期, 第 56—60 页。

⑥ 钱箭星:《国际政治经济与公共选择法——〈国际政治经济学〉评介》, 《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 年第 9 期, 第 73—76、63 页。

⑦ 任国明:《现代国际关系的新特征——介绍川田侃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 年 9 期, 第 59—61 页。

⑧ 例如, 黄仁伟:《步入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学——评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世界经济研究》1991 年第 1 期, 第 77—80 页; 任东来:《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与“霸权稳定论”——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 年第 6 期, 第 73—77 页。

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学的合作与争斗》和《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的《权力和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政治学》、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的《相互依赖经济学》、马克·阿姆斯特茨（Mark R. Amstutz）的《经济学和对外政策》以及戴维·布莱克（David Black）的《全球经济关系的政治学》等著作进行了综述。^①

对国外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文献的评论和介绍，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甚至是引领作用。一方面，它使中国学界及时了解国外研究现状和动态，推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它也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素材和借鉴。

此外，20世纪80年代，一些国外知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中国的学术交流活动也值得关注。例如，1986—1987年，美国富布赖特学者、瑞吉斯学院政治学教授里奥·张（Leo Chang）在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向学生介绍了国外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1988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三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约翰·鲁杰（John Ruggie）、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和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访问，并为研究生做学术演讲；1988—1989年，美国学者乔治·克莱恩（George T. Crane）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访问期间，讲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等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映出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时期，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非常缓慢，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决定的。但是，改革开放也为中国学者“向外看”提供了便利，它使这

^① 例如，倪世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介》，《世界经济文汇》1986年第3期，第29—34页；吴开平、桑玉成：《国际经济政治学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7年第4期，第31—36页；陈德照：《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初探》，《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年第10期，第1—7、57页。

一时期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呈现出学习、借鉴的特点。国外论著的翻译与评介以及中外学者的交流,使中国学者逐步认识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范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有学者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学界呈现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兴起的早期迹象。^①

二 冷战后的本土化探索

从公开出版的论著来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尝试主要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这一时期,以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全球化深化发展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为了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步体现出本土化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中国视角、中国话语和中国情怀。

(一) 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

冷战结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趋势。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新变化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对中国学界认识世界带来了冲击,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全球经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持续加深。全球化的巨大力量使各国日益相互依赖,世界政治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但长期以来,由于国际上东西方市场的长期分割与相互孤立,所谓的“全球化”主要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一体化。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东西方阵营长达 40 余年的冷战宣告结束后,全球经济日益融合成一个大市场,由此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成为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全球化进程所经历的里程碑式的变化,既使得所有国家

^① Gregory Chin, Margaret M. Pearson and Wang Yong, “Introduction-IPE with China’s Characteris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0, No. 6, 2013, p. 1149.

都置身于新一轮全球化大潮之中，也使各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其次，国际政治力量加速分化，多极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早在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演讲时提出，世界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而且有美国、西欧、苏联、中国、日本五大力量中心。^①如果说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说”是从经济方面的潜能所做的趋势性推测，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这种趋势则更多的是一种现实性的描述。冷战结束宣告了两极格局的终结，原来维持世界秩序的两极体系随之土崩瓦解。尽管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由于各种力量的崛起和重新分化组合，美国已无力建立由其主宰的单极世界秩序。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持续提升。冷战后以多极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曲折前行，而且中国在其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最后，跨界、跨领域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显，国际竞争与合作呈现新的形式。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加，除了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气候变化、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国际恐怖主义等新问题不断涌现，甚至一国内部的经济金融风险和危机也能迅速传导到其他国家并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损失。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单靠任何一国或者少数几个国家的力量去实现，并且由于其跨领域的联动性，在任何单个领域范围内都不可能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面临这些挑战，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协调一致共同承担治理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责任，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利益与命运共同体。与冷战时期相比，单纯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已不复存在，竞争与合作并存更加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常态。

（二）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探索

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的变迁推动了一大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对新兴

^① Tom Switzer, "The World Today, Foretold by Nixo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5, 2011.

问题的探索,中国学者在这一波浪潮中开始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探索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视角和本土化问题。

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在跟踪国外研究前沿的基础上尝试建立国内的课程体系,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1991 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了题为“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的国际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本土化发展的探索。^①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和国际经济系联合成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课题研究组。1993 年,该课题组编写完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和讲义。1994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决定在全国高校的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等专业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必修课。其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也开始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始设置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1999 年,中国人民大学宋新宁和陈岳撰写的系统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②该书“严谨的立论和深刻的论述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③

1996 年,武汉大学的陈必达和许月梅曾撰文呼吁建立一门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关系的经济学新兴综合性学科,并提出涵盖国际经济竞赛、世界经济格局、国家经济利益、国家经济实力、对外经济手段、国际经济合作、国家经济安全等内容的学科基本框架,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初步思索。^④两者合著的《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学》也由此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探索的早期研究成果之一。^⑤同期,一些学者在评介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开始尝试表达自己的

① 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3。

②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③ 徐瑞芝:《构建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华读书报》2000 年 10 月 25 日。

④ 陈必达、许月梅:《国际政治关系的经济学论纲》,《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 年第 6 期,第 16—20 页。

⑤ 陈必达、许月梅:《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

观点，并对一些理论与现实问题提出了中国视角的思考。^①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步体现出本土化发展的趋势，并开始尝试构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和研究体系。但是，此时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建立一门学科所必备的条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②

（三）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这一时期，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研究议题主要围绕中国当时面临的重大国际国内问题而展开。这些问题涉及冷战给世界和中国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探索等多个方面，并主要反映在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索上。

第一，关于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的分化组合使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新的形式。^③对此，中国学界所形成的基本共识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上升。有学者提出，经济的力量、财富的力量将日益取代军事的力量、暴力的力量，成为国际政治相互交往的主要手段，领土争端与军事对峙等不能掩盖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趋势。^④ 尽管政治的、意识形态

① 例如，杨雪冬：《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 年第 9 期，第 22—25 页；许宏强：《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介评》，《经济学动态》1998 年第 3 期，第 66—70 页；宋新宁：《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国际论坛》1999 年第 2 期，第 3—10 页等。

② 梁守德认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以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为基地；二是设置专业，招收学生；三是开设专业课程，评定专业职称。参见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1 页。

③ 这一时期，有学者将冷战后的主要世界力量组合划分为：经济上美、欧盟、东亚的三足鼎立，政治上美欧俄和美中日两个三角分别在欧洲和亚太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参见宋以敏《关于冷战后世界力量划分及组合问题的探讨》，《国际问题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4 页。还有学者认为经济上表现为美、日、欧三极格局，政治上表现为中、俄、德、日等多极的政治体系，参见曹建增《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和经济霸权的新构建》，《世界经济》1998 年第 4 期，第 11—13 页。

④ 刘慧华：《谈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经济主义潮流》，《社会科学》1993 年第 9 期，第 17—21 页。

的、地缘的和军事的等各种因素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但经济安全、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① 据此,有学者提出了“国际经济政治”概念,并认为冷战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际经济政治”从隐性化走向显性化,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各国政府最为关注的中心问题。^② 二是经济与政治的联动性加强。为此,中国学界开始对一些国际经济问题的政治因素和影响以及国际政治问题的经济因素和后果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论述了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认为经济全球化能够起到降低大国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和加快不同政治文化的融合等作用,各国经济利益的融合、经济联系的扩大以及经济利益的跨国发展,能使国家间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相似性更强、东西矛盾趋于消失以及南北矛盾进一步弱化。^③

对于冷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调整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的变化,有学者认为其促进了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并由此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加速形成,进而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④ 关于国际经济关系与国家主权,有学者认为,在迅猛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中,旧的国家主权概念受到了现实的挑战,主权原则的行使也受到多方面的制约。^⑤ 还有学者将政治因素纳入对双边经贸关系的考察中,提出冷战思

① 参见王庆海:《冷战后影响国际关系诸因素的新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 年第 8 期,第 44—48 页;王持明:《经济因素已经主导国际政治关系了吗?》,《国际经济评论》1997 年第 11/12 期,第 41—42 页;等等。

② 柳剑平:《冷战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际经济政治”显性化的原因分析》,《世界经济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11—14 页;柳剑平:《冷战后“国际经济政治”显性化原因分析》,《当代亚太》1997 年第 4 期,第 54—57 页。

③ 阎学通:《评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国际经济评论》1998 年第 9/10 期,第 28—30 页。

④ 梁凯音:《论冷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 年第 5 期,第 48—52 页。

⑤ 张锋:《冷战后国际经济合作与国家主权》,《国际政治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27—31 页。也有学者认为,冷战后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加强并没有限制国家主权,而是主权国家在平等互利、承认对方主权为前提的基础上的交往与合作,国家主权的本质和原则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这与国家主权受到挑战的观点并不矛盾。参见姜安、李全:《冷战后的世界经济政治与国家主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6 期,第 38—42 页。

维、外交思想、公众舆论、利益集团、党派之争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冷战后的中美贸易的发展。^① 这些研究初步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基本看法。

第二，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进入 90 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随之加强。这既表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上，也表现在中国融入国际市场和适应国际规则的适应上。^② 关于区域合作，王正毅从世界体系角度对东南亚地区 10 国的发展与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③ 此外，张磐提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的复杂性制约了大区域的集团化，为亚太地区合作的多层次性和灵活性提供了解释。^④ 关于国际经济规则，有学者提供了有关民族国家同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机制相互作用方式的结构分析，提出国际贸易机制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国也能够成为推动国际贸易机制进一步走向公平合理的积极因素。^⑤ 此外，还有学者从企业层面分析了世界市场经济规则的影响。^⑥ 关于对外开放，梅荣政认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利用国际市场增强自己经济力量的必然性在于，在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企业甚至个人的经济活动连接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开放、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开放性世界经济整体。梅荣政还注意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发达国家对

① 邓常春、任卫峰：《冷战后影响中美贸易的政治因素》，《南亚研究季刊》1998 年第 4 期，第 62—65 页。

② 1991 年 11 月，以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为标志，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区域合作。1994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与此同时，中国为“复关”以及加入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③ 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④ 张磐：《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我国的对外开放》，《亚太研究》1992 年第 1 期，第 6—9、29 页。

⑤ 乔轶美、尹凡：《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国际观察》1999 年第 3 期，第 38—41 页。

⑥ 何建民：《论世界市场经济规则下我国外贸企业经营的新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年第 1 期，第 71—74、79 页。

发展中国家依赖的现象十分突出。^① 魏民阐述了经济对外开放的政治影响,认为开放度的提高加大了保持政治稳定的难度,国家经济独立遭受更大冲击,维护国家政治独立的压力也随之增加。^②

第三,关于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思索。20 世纪 80 年代末,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③ 此后,很多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与讨论,并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由此推动了对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深入理解。一些较早探讨这一问题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必须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同步进行,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离。前者为后者提供必要的政治前提,后者为前者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④ 此后,张小劲和宋新宁对国际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专门探讨,并提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相互交融在一起,相互作用、互为条件。^⑤ 在世纪之交,一些学者的讨论与争鸣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例如,庞中英认为,世界秩序在经历了冷战后一段特定的历史过渡时期之后,形成

① 梅荣政:《对外开放的经济政治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6 期,第 15—20 页。

② 魏民:《论经济对外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政治稳定》,《求实》1996 年 11 期,第 22—25 页。

③ 从 1988 年起,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多次阐述这一问题。例如,1988 年 9 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时提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1251 页。1988 年 12 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参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 282 页。1989 年 10 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参见《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 328 页。

④ 参见良月《关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 年第 9 期,第 22—27 页;良月:《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再思考》,《国际政治研究》1991 年第 3 期,第 33—38 页;李琮、谷源洋:《继续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 年第 10 期,第 6—9 页。

⑤ 张小劲、宋新宁:《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交融与互动》,《教学与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33—38 页。

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跨大西洋联盟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① 李滨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是一种由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并建立在一定的物质优势、制度规范和某种道义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其实质是一种美国的霸权秩序。^② 李清津则认为，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弱势秩序形态，具有复杂的变动性，新旧国际秩序的过渡还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③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已具有了广阔的视野，对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与事件均表达了中国视角的回应，因此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导向性较强，理论建树较少，形成了不同于同时期西方重视理论与范式的构建的发展模式。

三 21 世纪的专业化发展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加。从中国知网的文献统计来看，1985—2000 年，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主题的文献为 1097 篇，其中 2000 年以来发表的文献为 1007 篇，占统计期间文献数量的 91.8%（见图 1）。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已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这一方面得益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多年来的孕育和探索，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加入 WTO 后深度融入世界以及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有密切联系。

（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专业化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化方面，北京大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北

① 庞中英：《“冷战后”的终结与中国的回应》，《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 9 期，第 5—10 页。

② 李滨：《“冷战后”世界秩序与新世纪中国外交——与庞中英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1 期，第 76—79 页。

③ 李清津：《冷战后时代终结了吗？——当前的国际秩序与中国的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2 期，第 75—8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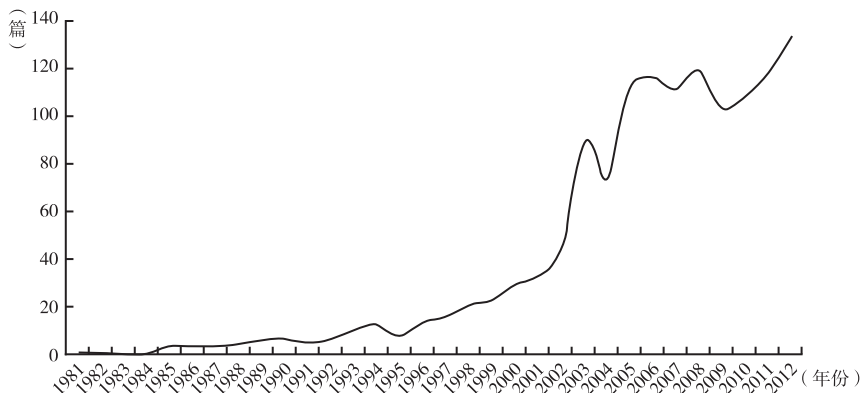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知网主题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文献数量

说明：检索结果为输入主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或“国际经济政治学”和/或“IPE”后所得到的文献篇数；由于统计数据只是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发表的大体趋势，故未对文献的相关性进行区分；2013 年中国知网未收录部分专业期刊，故未纳入检索范围。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2014 年 8 月。

京大学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立研究中心，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2001 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该中心的成立，推动了对加入 WTO 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互动日益深入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的研究，并从中国与全球经济关联性的视角出发，探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经济治理机制转型，分析贸易、货币与金融、跨国投资、产业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相关领域的国家政策。^① 二是开设专业，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2002 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设置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本科专业，并成立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此后，这一专业扩展到研究生阶段。

作为全国最早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高校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国内第二个设置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高校。2007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将研究生阶段的国际政治专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升级为

^① 关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的详细信息，可访问下列网址：
<http://www.ipe.sis.pku.edu.cn>。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并在其下设置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贸易与金融国际政治经济学、能源与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制度与全球经济治理等研究方向。此后，复旦大学、外交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纷纷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专业下招收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见表1）。此外，辽宁大学还自主设立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点，招收并培养该研究领域的博士研究生。由此可见，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余年中，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已形成了覆盖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完备的学科培养和发展体系。此外，在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成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以推动该学科研究的专业化。

表1 2013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博士点情况

序号	院校	专业	研究方向
1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	— 国际政治经济学
2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	—
3	复旦大学	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经济学
4	外交学院	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经济学
5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经济学
6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7	南京大学	政治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
8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世界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
9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
1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世界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说明：排名不分先后。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招生目录整理。

与学科的专业化相适应，一些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材也相继面世，如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的《国际关系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作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国际政治经

经济学通论》等。^① 这些教材积累了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 全面梳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沿革, 在框架、内容、视角、观点等方面都体现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既反映了国际学界前沿动态, 又体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视角”。

(二)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按照科恩 (Benjamin J. Cohen) 的界定, 一个学科领域的形成在于拥有一个制度化的学者网络, 一个有着属于自己的研究边界、报偿体系和职业生涯的独特研究共同体。^② 尽管国内目前尚无专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正式学术团体, 但长期以来, 相关专业团体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平台。其中, 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主要包括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CNAIS) 和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这两个团体吸引了全国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一流专家和学者, 并提供了联系与交流的平台。此外, 清华大学于 2008 年倡建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这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开放平台,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和研究生都参与了其中的学术活动。

2010 年,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等机构联合发起的、每年定期召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成立, 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论坛的创办, 一方面为构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 以及为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人员了解学科最新动态和交流最新研究成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国际

① 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该书作为教材后经部分修订更名为《国际关系的新政治经济学》, 参见张宇燕、李增刚《国际关系的新政治经济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其他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材还包括: 朱文莉:《国际政治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王健:《国际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王子昌:《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论》,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门洪华主编:《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② 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 2.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平台。截至 2014 年，该论坛共举行了 5 届，论坛的主题涉及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货币政治、新兴经济体、全球治理、国家安全等诸多领域（见表 2）。

表 2 历届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概况

届次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论坛主题
1	2010 年 10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
2	2011 年 11 月	国际关系学院	货币政治与国际关系
3	2012 年 11 月	复旦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新兴经济体与国际关系
4	2013 年 10 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
5	2014 年 9 月	辽宁大学	总体国家安全观: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相关的连续性学术会议还有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发起的“博士生论坛”，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共同发起的“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这些会议都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议题，并为从事该议题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了锻炼的机会。

（三）相关研究成果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外大量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中译本的出版，国内学界对国外相关论著的评述更加全面和深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综合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涉及面更广。这方面的成果侧重介绍国外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方法等进展的总体情况。^① 其中，复旦大

① 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欧洲》2002 年第 1 期，第 27—37 页；朱文莉：《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91—97 页；李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10 期，第 68—80 页；严波：《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国外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第 9—13 页；等等。

学樊勇明教授对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介绍和评论,反映了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与进展。^①二是对国外学者或著作中的理论和观点的分析更为集中和深入。^②三是对不同流派和观点进行比较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运用比较方法,分析了不同流派、不同学者在研究方法、学术观点上的异同。^③迄今为止,国外当代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在国内学界均有相应的述评。国外论著评介方面的成果对推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世界接轨、促进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这一方面研究成果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重点著作的评介逐步过渡到系统论述,从全面评介论著思想逐步过渡到深入探讨重要观点。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学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日益兴盛,一些原创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论著也相继面世。^④2003 年,王正毅和张岩贵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出版。该书从国家和市场的古典理论、当代理论及其现实经验分析三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及相关研究方法,总结了其理论范式,并运用相应理论与方法对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等影响当代国际体系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⑤2005 年,李滨出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

①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② 例如,郑先武:《“国家中心”现实主义的解读——评〈全球政治经济学〉》,《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8期,第62—63、21页;王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学说——评析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导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13—18页;等等。

③ 例如,张建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一种比较分析》,《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第26—33页;任湘怡:《国际与国内:双向互动——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第21—25页;白云真:《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39—154页;王勇:《国际政治经济学美英学派的论战——学术分野、国家地位与中国议题》,《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137—152页;等等。

④ 为了避免与下文对研究成果的分议题论述重复,本部分主要侧重于对基本理论、方法等方面成果的评述。

⑤ 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一书。该书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的动力，国际市场体制塑造和变革的方式，国际市场体制及其运行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产生的影响，国际市场体制下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关系，国际贸易体制、货币与金融体制、跨国生产方式产生的动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及其政治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可能带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结果等。^① 2008年，邝梅在著作《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因素分析》中运用制度分析以及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探讨了国内利益集团、左右翼政党、民主模式等因素在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流动政策中的作用等。^②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从2008年起，复旦大学樊勇明教授开始编写“复旦国际政治经济学丛书”，推出了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③ 该套丛书对跨国公司、贸易摩擦、区域合作、超国家治理、能源问题、信息技术空间等问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等，进行了多领域、多角度的分析，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直以来，学界对有没有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是存在分歧的。^④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原创性的基础理论以及基于中国问题的

① 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② 邝梅：《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因素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邝梅：《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因素分析》（第2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③ 该丛书主编为樊勇明，主要书目包括：黄河：《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陈玉刚：《超国家治理——国际关系转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孙溯源：《国际石油公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樊勇明、贺平、黄河：《贸易摩擦与大国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樊勇明、薄思胜：《区域公共产品理论与实践——解读区域合作新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张建新：《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杨剑：《数字边疆的权力与财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黄河：《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张建新：《能源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④ 21世纪初，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曾引起诸多学者的思考。这一问题的提出也对“有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否定性的回答。参见王义桅：《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0—21页；苏长和：《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第26—30页。如今，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虽然没有对“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展开广泛讨论，但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理论探索的缺失,另一方面也由于过于陷入西方理论的框架体系。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些探讨,宋国友认为主要集中于国外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渊源、概念梳理、学科演变、研究范式、学术流派、路径创新以及观点论争等内容,但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较少涉及中国问题,很少有学者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核心概念来解释和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通过中国案例来验证和修正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①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学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西方既有理论成果的引进和介绍。^②例如,复旦大学樊勇明等在瑞典外交部发展问题专家小组 2000 年工作报告的基础上,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做了重新诠释和改造,使得西方学界原本只用于对外援助效果分析的区域公共产品理论,被充实扩展成能用于解释区域合作的新视角、新方法。

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运用上,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学方法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即使是案例研究,也只是运用一般性的归纳与演绎方法。这使得中国学者难以与国际同行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也使相关研究成果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以计量方法为基础的实证研究逐步运用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诸如回归分析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所运用。^③当然,中国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的多元化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对于西方学者对多种方法的熟练运用,这一进程还十分缓慢。

① 宋国友:《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领域、理论突破和学科弥合》,《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 期,第 62 页。

② 参见李巍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理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和地区主义理论等基础理论进行的评述。李巍:《IPE 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评估》,《国际政治科学》2012 年第 1 期,第 143—149 页。

③ 以《世界经济与政治》期刊“国际政治经济学”栏目刊发的学术论文为例,在 2013 年发表的 8 篇论文中有 2 篇运用了实证方法,占这一领域发文总数的 25%;而 2014 年前 8 期这一栏目刊发的 8 篇论文中,运用实证方法的论文就达到了 3 篇,占发文总数的 37.5%,这一数据比上年水平提升了 12.5 个百分点。

(四) 21 世纪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从根本上来讲,国际政治经济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主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纵深发展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日益深入,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注重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互动。这尤其反映在对涉及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领域的研究上。诸如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与货币的政治经济学、跨国资本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与援助的政治经济学、能源与气候的政治经济学等议题,逐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次级研究领域。此外,贯穿这些领域的国际制度研究亦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并成为与其他议题既相互联系又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研究领域。由此,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涵盖了以下七大议题。

一是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尤其是在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国学界非常关注国际贸易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例如,北京大学王勇突破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构建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框架分析国际贸易问题,为揭示国际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性质贡献了新的认识。^①关于国际贸易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中国学者对贸易政策、贸易保护与贸易摩擦以及贸易规则及其谈判等方面尤为关注。关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既包括一般性的理论探讨,也包括国别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中,在国别贸易政策制定方面,中美两国的贸易政策成为关注的重点。^②

① 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全球贸易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

② 在理论探讨方面,参见宋世方《国际经贸政策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余森杰:《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关于中国和美国两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参见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林玲、刘恒:《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 年第 5 期,第 23—26 页;李荣林、马海:《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亚太经济》2006 年第 5 期,第 59—63 页;李坤望、王孝松:《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以 PNTR 议案投票结果为例的政治经济分析》,《经济学》(季刊),2009 年第 8 卷第 2 期,第 375—395 页;等等。

中国学界对贸易保护与贸易摩擦的关注,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演进分不开。过去 30 多年,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其主要来自对外贸易顺差。为此,中国遭受了来自贸易逆差国尤其是美国的多种形式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这促使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①其中,在贸易失衡与贸易摩擦问题上,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广受关注。^②在以 WTO 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各成员之间的国际贸易博弈,主要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则约束的合作性有序博弈,这种博弈不仅受到国家利益的驱使,也要符合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要求。这不仅彰显国际贸易规则的重要性,更激发人们对贸易规则建立过程的思考。^③关于国际贸易谈判,中国学者还构建了政治经济分析框架。^④此外,关于国际贸易的政治与安全溢出效应的考察也为一些学者所关注。^⑤

二是国际货币金融的政治经济学。随着中国金融实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弊端日益显露,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日益重视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研究,但研究主要围绕国际货币金融合作、汇率政策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与中国联系十分紧密的现实问题展开,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进展。一般来说,国际货币与金融合作是国家获得相关

① 相关研究参见保健云《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及政策选择》,北京,经济学出版社,2010;李淑俊、倪世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对未来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 年第 3 期,第 47—52 页。

② 例如,王勇:《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美国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47—57 页;樊勇明、贺平、黄河:《贸易摩擦与大国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陈仁新:《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李丽:《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37—41 页。

③ 刘光溪:《共赢性博弈论: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④ 例如,何帆:《国际贸易谈判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个初步的框架》,《公共管理学报》2004 年第 1 期,第 36—42 页;杨毅:《国际贸易谈判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国际论坛》2012 年第 2 期,第 56—60 页;等等。

⑤ 宋国友:《贸易增长、利益集团与国家间冲突》,《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6 期,第 18—23 页;郎平:《贸易是推动和平的力量吗?》,《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10 期,第 45—51 页;郎平:《贸易制度的和平效应分析——基于地区特惠安排与全球贸易体制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7 期,第 66—72 页。

经济收益和避免相关风险的一种手段。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国际货币与金融合作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例如，货币具有国家和权力的特征，它所反映的是建立在国家权威基础上的社会信用关系；^① 货币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的，货币关系最终反映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制衡，因此任何形式的货币合作离开政治合作都是不可能的，货币合作必须具备良好的、现实的政治基础。^② 关于汇率及其制度安排，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它是由现实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及其互动决定的。^③ 并且，有学者将汇率制度的选择概括为三种路径：霸权国家的偏好、国内社会利益集团、国内政治制度。^④

对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国内学界也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给出了解释。^⑤ 此外，还有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汇率对双边贸易的影响。^⑥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对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金融危机给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如

① 张宇燕、张静春：《货币的性质与人民币的未来选择——兼论亚洲货币合作》，《当代亚太》2008 年第 2 期，第 9—43 页；冯维江：《国际货币权力的历史经验与“第三世界货币区”的可能性》，《当代亚太》2010 年第 5 期，第 23—50 页。

② 李巍：《货币竞争的政治基础——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外交评论》2011 年第 3 期，第 44—61 页；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当代亚太》2012 年第 6 期，第 22—46 页；王勇辉：《东亚货币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③ 张宇燕、张静春：《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当代亚太》2005 年第 9 期，第 3—20 页；何帆、李志远：《汇率变动与汇率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11 期，第 26—31 页。

④ 王正毅、曲博：《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分析——三种研究路径比较及其启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第 59—65 页。

⑤ 例如，李增刚、董丽娃：《汇率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为例》，《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5 年第 6 期，第 44—51 页；高乐咏、王孝松：《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探讨——政治经济学视角》，《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第 108—115 页；李子联：《政治与汇率：人民币升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9 期，第 136—155 页。

⑥ 例如，林乐芬、唐昆：《多维视角下中美贸易巨额逆差成因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3 期，第 105—120 页。

金融危机的根源、危机防范与国际金融监管等。^①

三是区域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在对区域一体化议题的研究上,强调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而在区域的选择上,出于一体化的影响与地缘因素,中国学者较为关注欧洲以及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关于欧洲一体化,宋新宁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一体化或政治一体化,而是政治经济一起交织并进、相互作用的过程,经济一体化中包含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推动着经济一体化。^② 也有学者强调国内政治对地区一体化的影响以及注意到发展中地区一体化的独特性,并提出内部—外部双层结构的分析框架。^③ 而在理论上,樊勇明关于区域公共产品的探讨为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解释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④

但是,从具体的研究问题来看,中国学者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区域一体化的动因、政策及其收益等方面。关于区域一体化的动因,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研究思路:一是强调经济一体化的政治因素;^⑤ 二是强调政治与市场的共同作用。^⑥ 关于区域一体化政策,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对于政府和利益集团等因素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① 例如,李本松:《国际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 邝梅:《美国金融危机:新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李莉、何帆:《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5 期,第 27—36 页; 穆良平、张静春:《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 5 期,第 121—132 页。

② 宋新宁:《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国际观察》2004 年第 5 期,第 1—10 页。

③ 例如,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5 期,第 4—10 页; 徐秀军:《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南太平洋地区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3 期,第 138—155 页; 等等。

④ 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 期,第 7—13 页; 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 期,第 143—151 页。

⑤ 例如,高程:《区域合作模式形成的历史根源和政治逻辑——以欧洲和美洲为分析样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 10 期,第 33—57 页。

⑥ 例如,李晓、丁一兵:《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推动力与大国关系——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的考察》,《学习与探索》2007 年第 5 期,第 146—151 页。

阐释。^① 关于区域一体化的成本与收益，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也进行了广泛讨论。^②

四是国际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议题的兴起与中国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实力与地位的持续上升不无关联。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实际问题，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益分配以及投资保护主义等方面。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一些学者认为发达市场国家利益集团的偏好和选举周期影响了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因此应对资本流动产生的跨国溢出效应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构建反映新的实力分配的全球治理框架，从而寻找到集体利益和本国利益的平衡点。^③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益分配和投资保护主义，有学者认为其源于国家间的政治博弈以及受国内不同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和思想流派的差异的影响。^④

此外，一些关于跨国公司的分析也拓展和深化了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例如，有学者注意到跨国公司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影响权力或利益分配关系、重塑体系结构的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面向全球的投资、生产和经营，深刻改变了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模式。^⑤

① 例如，曹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曹亮、董怡、席艳乐：《英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决策的政治经济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2期，第39—44页。

② 例如，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5—34页；孟夏：《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81—92页；邝梅、周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创建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第50—64页。

③ 例如，韩剑、高海红：《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123—136页；邝梅、张瑞：《资本流动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25—33页；韩剑、徐秀军：《美国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8期，第135—154页。

④ 例如，钟飞腾：《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一种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12期，第137—151页；翟东升、夏青：《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CFIUS改革为案例》，《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1期，第56—62页。

⑤ 例如，孙溯源：《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反思与重构》，《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6—71页；以及上文提到的黄河的著作。

五是国际发展援助的政治经济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对外发展援助项目不断增加,并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重要捐助国。相应地,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尽管在国内较少有人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国际发展援助,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重国际政治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将国家对外政策行为与国家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援助与发展议题。^①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尽管国际发展援助在形态上反映的是资金援助和资源流动,并且是一种经济性政策行为,但它往往受到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安全等关系的影响,也反映了援助国的安全、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等特定的政策目标。^②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对外援助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国内因素的外化问题。^③在国别研究上,近年来中国学界尤其关注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对外发展援助的理念、动因、模式、效果的研究;^④二是中外比较研究,从而展现中国对外发展援助的特色。^⑤国际发展援助丰富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充实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

① 参见李小云、唐丽霞、武晋编著《国际发展援助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② 参见林晓光《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国际援助为视点》,《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第17—22页;丁韶彬、杨蔚林:《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政策目标及其实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第59—65页;张清敏:《援助外交》,《国际论坛》2007年第6期,第17—22页;熊文驰:《人权、援助与发展问题——以非洲国家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77—97页;张丽娟、朱培香:《美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与效应评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51—58页;舒建中:《美国的战略性对外援助: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82—94页;彭文平:《从“国际经济政治化”角度看日本对东盟的经济援助》,《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1期,第24—27页;周玉渊:《从东南亚到非洲: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当代亚太》2010年第3期,第107—124页;等等。

③ 周弘:《对外援助与现代国际关系》,《欧洲》2002年第3期,第1—10页。

④ 例如,熊厚:《中国对外多边援助的理念与实践》,《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49—63页;赵长峰、薛亚梅:《新形势下中国对非援助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第139—143页;张海冰:《发展引导型援助:中国对非洲援助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⑤ 例如,魏雪梅:《冷战后中美对非洲援助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张海冰:《中德对非洲援助政策的比较分析》,《德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35—41页;姜磊、王海军:《中国与西方国家对外援助比较分析——基于附加政治条件的研究》,《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6期,第32—36页;等等。

六是能源和气候的政治经济学。近年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分析能源尤其是石油问题的成果颇丰,关注能源供应的政治经济因素以及能源短缺和价格波动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成为其中的主流,而对于石油外交和石油安全的解读更能体现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优势。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查道炯从石油的供应和运输层面,研究了中国面临的石油安全问题,并重点关注了中国与境外市场的互动以及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中国对外政治关系的发展;^① 张宇燕和管清友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世界能源市场结构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石油的政治属性,其价格波动从长期来看还取决于世界能源格局中消费国和生产国权力的消长;^② 李若晶在梳理1945—1975年的美国对中东石油外交的演变历程后,提出公司主导政府、国内主导外交、利益主导安全、竞争主导合作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美国对中东石油外交的政策与行动。^③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④ 国内学者关于气候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⑤ 而对于一国的气候政策,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因素仍成为阐释动因的重要解释变量。^⑥

七是国际制度(规则)的政治经济学。^⑦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际规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也日益成为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和制定者,国际制度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由于国际制度涉及领域的综

① 查道炯:《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② 张宇燕、管清友:《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世界经济》2007年第9期,第17—30页;管清友:《加入预期因素的多重均衡模型: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国际市场油价波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期,第69—74页。

③ 李若晶:《失衡的依赖——美国对中东石油外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1945—197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④ 董德利:《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述评》,《经济与管理评论》2012年第4期,第25—32页。

⑤ 例如,崔大鹏:《国际气候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⑥ 赵行姝:《美国气候政策转向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当代亚太》2008年第6期,第39—54页。

⑦ 如上文所述,与其他研究议题相比,国际制度研究具有更加明显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为了反映其与其他议题的不同,本文单列阐述。

合性,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国际制度更为学界所青睐。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关于国际制度(规则)的非中性与合法性研究。自从 1994 年中国学者提出“制度非中性”概念后,制度的非中性本质逐步延伸至对国际制度的分析之中。^①例如,从国际经济规则的外部性与非中性出发分析规则制定权的收益来源、规则制定的决定因素以及规则形成的具体机制;^②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美国构建新帝国体系的逻辑和路径;^③运用制度非中性分析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产生的动因;^④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学者考察了全球化、地区一体化、权力结构变迁背景下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面临的合法性问题。^⑤其二,关于国际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学者田野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对国际制度的供求、需求以及形式选择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⑥其三,关于新兴国家与国际制度变革研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与国际制度(规则)的互动关系一直为中国学者所关注。^⑦与此同时,新兴

①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 年第 2 期,第 97—106 页。

② 例如,李向阳:《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9 期,第 67—76 页。

③ 例如,高程:《新帝国体系中的制度霸权与治理路径——兼析国际规则“非中性”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战略》,《教学与研究》2012 年第 5 期,第 57—65 页。

④ 例如,徐秀军:《制度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6 期,第 77—96 页。

⑤ 例如,陈东晓:《试论国际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美国霸权的互动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5—14 页;赵可金:《从旧多边主义到新多边主义——对国际制度变迁的一项理论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7 期,第 26—32 页;祁怀高:《国际制度变迁与东亚体系和平转型——一种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4 期,第 54—68 页;曲博:《合作问题、权力结构、治理困境与国际制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0 期,第 22—32 页。

⑥ 例如,田野:《全球治理中的制度供给:一种交易费用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10 期,第 17—22 页;田野:《交易费用理论视野下的国际制度需求分析》,《欧洲》2002 年第 1 期,第 12—20 页;田野:《国际制度的形式选择——一个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模型》,《经济研究》2005 年第 7 期,第 96—108 页;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⑦ 例如,苏长和:《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10 期,第 5—10 页;刘宏松:《中国参与非正式国际制度:以 APEC 和 ARF 为例》,《国际展望》2009 年第 1 期,第 42—54 页;东艳:《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第 45—64 页。

国家群体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变动对国际机制的影响也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① 具体而言,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合作机制以及包含新兴国家成员的二十国集团(G20)合作机制尤受学界关注。^② 其四,关于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的互动关系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打开了国家“黑箱”,将国际制度与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建立了国内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利益之间的联系。^③

总之,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尚处于本土化的探索阶段,那么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步走上专业化道路。这不仅表现在学科设置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上,也表现在研究成果的丰富与研究议题的多样化方面。

四 总结与展望

从上文分析来看,中国学界未能赶上国际政治经济学广泛兴起和兴盛的潮流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中,尤其是

① 例如,王玮:《国际制度与新进入国家的相互合法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74—88页;朱锋:《新兴大国的合作机制建设——推动国际制度发展的新动力?》,《当代世界》2010年第11期,第7—10页。

② 在金砖国家研究方面,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定期出版《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年度报告》和《金砖国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定期出版《金砖国家发展报告》等,其他成果有:黄仁伟:《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当代世界》2011年第5期,第24—27页;蔡春林:《金砖国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转型》,《亚太经济》2013年第5期,第8—13页;赵可金:《中国国际战略中的金砖国家合作》,《国际观察》2014年第3期,第44—58页;等等。在G20研究方面,参见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154页;朱杰进:《非正式性与G20机制的未来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第41—46页;等等。

③ 例如,王明国:《权力、合法性、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第57—63页;于宏源:《国际制度与政府决策转型》,《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1期,第31—54页;曲博:《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制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期,第61—68页;宋伟:《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单极地位——当前美国的国家实力、国内制度和国际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25—48页;田野:《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5—24页。

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并逐步形成了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不尽相同的学科发展历程和研究路径。总体来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适应国际形势变化、逐步走向世界和融入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两大突破:一是突破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局限,从兼顾政治与经济因素到注重两大学科的交叉与融合,逐步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综合性学科发展体系;二是突破了欧美发达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从大规模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转向立足中国国情的自主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制度化的学术网络,并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①

但是,与西方学界相比,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其独特之处。一是政策导向。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意识萌芽的时候起,每一次大的进展都能找到与其相对应的历史事件和相应的政策背景,因而其缘起、主题和目标都具有浓重的政策导向性。尽管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并非是靠政府的政策推动而不断发展的,但政策研究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迄今为止,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对政策研究的青睐仍是西方学界所不可企及的。二是现实导向。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很多学者热衷于揭示现实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满足了现实的需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实用主义色彩,并使其对于本土化理论建构的热情相形见绌。三是宏观导向。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近年来涌现的大量微观研究不同,关注市场、国家、体系、制度等宏观问题以及对相应议题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宏观分析,占据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很大

^① 2013 年,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出版了一期介绍和评估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与进展的专刊,其中国内外学者均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成就给予了积极评价。参见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0, No. 6, 2013。

空间,而对于微观的企业、团体、族群、个人的关注则较少。^①

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进行了梳理,但认识则莫衷一是。例如,陈玉刚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认识不一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泛化以及研究上表现出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知识储备的不足等。^②王正毅则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制约因素归结为专业训练比较薄弱、分析性研究工具掌握不足、与中国关联性的研究较少以及学术共同体远未形成等。^③宋国友认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均存在较为突出的“脱离中国”现象。^④保建云从学科发展角度提出目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由于学科属性模糊、学科研究对象模糊以及学科研究方法不规范、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等,不能称为一门成熟而完善的学科。^⑤最近的一份研究认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有效缩小,这种差距表现在:一是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并没有完全形成,学者还没有形成身份认同,彼此的学术交流比较有限;二是研究队伍总体薄弱,研究议题存在严重失衡现象;三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四是对西方学术前沿的追踪不够。^⑥上述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不足之处在目前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专业基础相对薄弱、理论创新明显不足、分析工具存在局限、研究议题过于集中等问题表现得较为突出。

① 在中国学界,题目冠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研究成果颇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还存在很大空间。

② 陈玉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48—50页。

③ 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38—39页。

④ 宋国友:《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领域、理论突破和学科弥合》,《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59—76页。

⑤ 保建云:《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局限性、逻辑起点与微观基础》,《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1期,第74—80页。

⑥ 李巍:《IPE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评估》,《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1期,第169—173页。

但是,当提到中西差距时,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将会或者应该如何发展。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流派、范式和议题等方面均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动向。一是关于“大理论”和“元流派”的讨论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理论的多样性及其内部分歧日益受到关注;二是更具包容性的研究范式既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三是研究议题的拓展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兼容并蓄的学科。^①这同样勾勒出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未来的发展脉络。

本文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前景将主要呈现以下四种趋势或特点。

一是专业化发展。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制度化发展不仅是这一学科长期积累的必然方向,也是其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大势所趋。目前,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力量仍很薄弱,专业设置覆盖面仍很狭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相关知识的传播和后备人才的培养。未来在此方面,随着修学专业课程和获得专业学位的人员日益增多,将会有更多经过系统专业训练的中青年学者投身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事业之中,这一领域研究队伍的专业素养将会因此得到相应提升,从而推动整体研究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是多元化发展。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包括研究队伍、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多元化。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源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但研究人员的专业背景日益多样化,除了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具有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专业背景的学者也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当中。在此过程中,学科的交叉性特点将更加明显。随着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加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队伍当中,研究议题的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化还将继续,研究方

^① 徐秀军:《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范式与议题》,《国际政治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90—107 页。

法和分析工具将会更加丰富多样，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也将逐步趋于平衡。

三是制度化发展。目前，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建设正处于成长阶段，并已具雏形，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团体也正在积极推动之中。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将会组建更为规范和机制化的学术联合体，并以此为依托搭建各种学术交流与联系的平台，从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组织化和网络化。

四是国际化发展。所谓国际化，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的是中国学术成果的国际化，另一方面指的是中国议题的国际化。随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以及中外学界交流与对话的日益增多，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会日益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和认可。同时，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在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以中国为中心的议题将会受到更多关注，这将为国外学界深入了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而增加中国学界的国际话语权。